

大学与知识分子

郑也夫

Abstract: There are two parts in this paper. The first one is legitimacy of the certificate society, it includes three sections; 1) the class divisions within the knowledge society will survive forever; 2) the certificate society originated from ancient China; 3) the legitimacy of the certificate society. The second part discusses that university is the fittest community for intellectuals, it includes four sections; 1) university as a community for intellectuals; 2) the discussions about C. P. Snow's Two Cultures; 3)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nations' cultures in university; 4)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different generations in university.

一、学历社会的合法性

1. 随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在全世界的扩展,一场关于学历社会以及能人统治的争论席卷东西方。1978年《学历社会》一书在日本出版,它标志着这一问题引起了日本社会的重视。该书的作者说:“战前是个安静的学历社会,战后学校增多,学历不再是‘实力’”。他因此疑惑:今天以至明天的社会是否仍然是一个学历社会。不错,今天以至明天的社会将与日本战前的那个“安静的学历社会”大不相同,但它仍将是学历社会。从民众的感觉上看,日本63.2%的人认为存在着以一流大学为中心的学历社会,92.8%的人认为学历社会将继续存在(矢仓久泰,1982/1978:5—9)。从社会学的统计资料看,社会地位与学历,社会重要位置与名牌学校的学历,相关系数极大。从道理上看,学校的普及绝不会消除智力与学历上的分层;高等教育的普及会削弱大学学历持有者的“实力”,削弱有学历者与无学历者的鲜明反差,但是大学以上学历群体内部的差距会加剧,其中的更高学历者会取代“安静的学历社会”中大学学历者的优势——学历成为谋求社会职务与地位的重要手段,不仅不会消失,相反将更加普遍。如D.贝尔所说:“到那时,最为重要的是知识社会本身的内部分别。(它)将保持下去并永久存在。”(贝尔,1986/1973:272)

2. 学历社会繁荣于西方,却是发源于中国。公元587年隋朝的开国皇帝杨坚创立了以考试选任官员的科举制。以后经唐宋两朝的改进,科举制渐渐完善。

科举制产生于两个原因。第一,掌权者个人的原因。在魏晋时代(公元220—316)官员以举荐的方式从贵族中产生。皇帝在与贵族斗争、努力消除封建的过程中,希望摆脱贵族的束缚,找到一种更有效能、更能为其所用的官僚机构。科举制可以满足他的这种愿望。第二,社会结构中的原因。几乎任何一个古代社会中都有贵族群体的存在。贵族的有闲性决定了其群体的数量在社会中必须是有限的,否则社会无法承受。但是贵族占用更多财产和妻妾又使得他们的生育能力与养育能力大大地高于平民,于是只消5—10代,贵族成员数量在社会人口中的比例就将失调,这一失调将使贵族成员疯狂地争夺资源,最终导致社会的崩溃。这一三段论——“最初贵族人数在社会中保有适当比例——贵族群体强大的生育养育力——最终比例失调、社会崩溃”,几乎是古代身份世袭制社会中的铁律。要走出这一恶性循环,就必须打破贵族的身份继承制,寻找一个新的机制,以此确定新贵之身份,限制社会上层集团的数量。古代的中国人选择了科举制。在任何一个社会中,社会晋升机制都是其社会结构的核心。因此可以说,587—1905年间,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国的文明,都是建立在科举制之上的。

自然,这个科举制及其所带来的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个学历社会是有其局限性的。第一,当时的教育远未普及,科举只确定了士农工商这一阶梯结构中的第一层,即学历只确定了社会上层。第二,被科举覆盖的知识范围非常狭小,科举激发的功利心将读书人驱赶到经学的道路上,扼杀了知识的开拓。第三,科举制具有抑制上层集团的数量功能,它被改进得非常严密,曾经被严格地执行,但在王朝经历了十余代,上层阶级虽经科举调节数量仍然渐渐增长后,他们就不甘顺从科举名额的束缚,于是科场作弊、官场买官流行起来,从而瓦解了科举,并使王朝走向覆没。第四,在可以抑制身份世袭的制度选择中,除了科举还有市场。对世袭而言,科举与市场颇有相似之处;但古代中国高扬科举,贬抑市场,使得晋升渠道变得单一。尽管如此,科举制本身是具有巨大积极功能的,所需改进是:第一,考核的知识内容要随时代更新;第二,科举不应成为社会中惟一的上升渠道。但是当1840年中国受到西方冲击,屡屡溃败,并发现自己知识上的不足时,竟断然废除了已有一千三百年历史的科举制。在以后的近百年间,中国不仅没有找到一种选官制度,从而使社会管理极度低效,并且当世界开始议论“学历社会”时,我们已被远远地抛出资历社会的大门,只能谈论历史。但我们必须研究它,因为它对我们也将不仅仅是历史。

3. 反对建立在学历基础上的能者统治的第一个理由是学历不等于才能。不错,学历未必等同于才能。那么什么能证明才能呢?成就吗?但是因为社会职务与位置是分层的,并且是在一代人刚刚进入社会还无实际成就时就开始分流。怎么评判才能?学历毕竟是一个低限度的成就。从另一个角度看,并非一切成就都是才能的证明。比如商业成就,在很大程度上靠的是运气。与之相比,由学历判断才能要可靠得多。所以当今的商业公司用人亦要看学历。因为运气即使重要,却是无从琢磨的变量,在确定的因素中学历与才能相关的概率更大些。甚至任何一种检测都只有相对的价值和可靠性。否则选拔人才就不再是人类社会中最微妙的事务。总统竞选中的演讲才能就真的等于担任总统的才干吗?学历毕竟意味公正,因为它毕竟与才能有着较大的相关性。商业的成功不必凭学历,比尔·盖兹即是最新的例证。商业标准与学历标准的某种平衡才使一个社会拥有了更宽阔的上升渠道。

反对能者统治的第二个理由是公平。能者统治的辩护者说,应当追求的是机会平等,而非结局平等。能者统治的反对者说,机会不可能平等——遗传差距存在着,父母的影响也远未消除,所以只有追求结局的平等。应该承认,机会的平等确实难以做到,但是不管机会上平等与否,公正的追求都不可转向结局的平等。除了那并非公正,且不能促成大家的最大利益外,更在于结局的平等是根本追求不到的东西。其结果不过是以一种更恶劣的不平等取代原初的不平等。中国40年的社会实践证实着这一点。机会的不平等无法消除,只能减少。在学历社会中主要手段就是尽量使早期教育趋近平等。那么公正还有没有一丝平等作基础?有,惟一可能做到的是游戏规则平等。而学历社会所贯彻的正是这样一种平等与公正。它正像一场比赛,入场前运动员已经是不平等的了,结局时更加不平等,但比赛要坚定地捍卫过程中规则的平等,这规则拒斥特殊主义的原则,坚守普遍主义的原则。这是人类惟一可望做到的,学历社会正是以此为其基石。

4. 尽管自由主义是西方社会中最为强劲的思潮,但它无力捍卫学历社会的基本公正——游戏规则的普遍性原则。定额原则的推行就是对不公正的平等要求的妥协(贝尔,1986/1973:457-462)。对西方学历社会的这一挑战究竟是来自社会下层、弱者、一些少数民族,还是声称代表他们利益的思想家,是一个极有趣味的问题。

而当中国即将告别特权政治、跨入学历社会的门坎时所遇到的阻力却显然不是来自平民,不是来自一些仍有感召力的思想家,而是来自权势者——那些有权、有钱的人。当他们的子女在学历的竞争中失败,他们竭力进行一种交换。而学院,在瓜分国有资产的大潮中,不愿坚守那种严格的学历规则的价值观念,甚至乐于出售入学名额、学历,等等。瓜分国有资产的诱惑腐蚀着每一个领地,每一个个人。能者的统治理应先于制造能者的领地——学院开始,但中国的大学已向其社会认同,即使这里也绝非能者的统治。建设学历社会竟要从遵守规则学起,这就是中国40年来的遗产。

二、大学, 知识分子的社区

¹在一个已经或即将来临的学历社会中, 大学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有人说, 大学的社会作用仅次于政府。实际上在广泛性和深远性上, 大学的社会作用已经超过了政府。除了我们上面所说的那个巨大的潜功能——它以学历为社会成员们完成了最初的社会定位, 它的显功能也日益丰富——它集教学与科研于一体, 它是多种学科的交汇之地, 但是它之所以对社会发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还在于实用性学科的急剧进入, 使得社会无可替代地依赖于它。

这个日益芜杂的大学与那些传统知识分子、那些“理念的人”是什么关系呢? 我们说, 大学仍将是知识分子的社区。

大学离不开知识分子。爱因斯坦说, 科学的庙宇里有三种人: 第一种人是爱好科学的人, 科学给他们以超乎常人的智力上的满足; 第二种人是为了功利目的而来的; 科学的庙宇之所以存在并不取决于这两种人, 而依赖于第三种人——他们从事科学“是要逃避日常生活中令人厌恶的、粗俗的和使人绝望的沉闷”。雅斯贝尔斯说: “本真的科学研究工作是一种贵族的事业, 只有极少数人甘愿选择它……他们的本质特征是品德高尚、个体精神永不衰竭、才华横溢, 因此精神贵族只能是少数人。大学的观念应指向这少数人, 而芸芸众生则在对精神贵族的憧憬中看到了自身的价值……大学必须为他们提供机会。不言而喻他们才构成了大学生命的条件。”(雅斯贝尔斯, 1991/1977, 141—144) 罗素说: “‘无用的’学术, 如‘为学术的学术’, 是贵族的理想, 而不是财阀的理想……纯学术是与贵族政治相关的最好的东西之一……无论我们赞成与否, 工业主义必然革除贵族政治。因此, 我们不如下决心保住那些我们能够移植到新的和更有活力的观念中去的东西……我希望看到它在院校生活中的位置不断加强。”(Russel, 1926: 237) 大学离不开这少数知识分子, 是他们“无用”的知识构成了那些“有用的”知识的基础。尽管大学在实用化、世俗化, 毕竟有赖于少数精英使它形成了与社会间的张力。

知识分子也离不开大学, 大学是最适宜他生存的社区。L. 科塞为这种论断提供了以下理由: “1. 大学提供了这样一个环境, 在这里共同从事不受约束的智力追求的人们可以相互交流, 并在不断的交流中磨砺自己的思想。2. 大学定期支付教授报酬, 尽管大大低于一些非学术职业的报酬, 但能保证他享受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3. 大学向高级学院人提供任教期的权利保证……使学院人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 从而免于受到捉摸不定的市场的影响和经济压力的阻碍, 而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其工作中。4. 大学把其教师的时间安排制度化, 这样, 使他们能够把大部分工作时间投入到独立的思考和自主的研究中去。5. 最后,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大学承认其成员的学术自由”(L. Coser, 1970: 280)。科塞承认当代大学中存在着一些反向趋势, 他只是认为这些趋向还未破坏学院中的主要力量。

尽管东西方的大学殊为不同, 但科塞的理由对中国的知识分子大致上也是适用的。中国的知识分子毕竟在大学内比大学外享有更多的思想自由, 特别是当思想披上学术符号的外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未必达到了中产阶级, 但毕竟大学中的职务可以使他们较少受到市场的影响和压力。

既然看不到另一个更好的社区, 知识分子就必须关注和改善这惟一属于自己的社区。

2. 1956年C. P. 斯诺在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讲中提出: “西方社会的智力生活已日益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 另一极是科学家……从柏林顿馆到南肯辛顿或切尔西就像是横渡了一个海洋。”(Snow, 1963: 2—3) 此演讲引起轩然大波, 因为隔阂由来已久。如E. L. 博伊所描述的: “某校需要把人文学科和专业技术学科两方面的教学人员召集在一起开个和平会议, 误会和敌意所造成的‘两种文化’的冲突是惊人的。”(Boyer, 1987: 106) 斯诺不过是触到了痛处。二百余年来工业革命为社会带来的分工化、复杂化, 使得相互的理解日益艰难, 岂止是人文学者与科学家。斯诺坦言: “‘两’是个非常危险的数字……这个选择好不好, 我不敢肯定……有一百零两种文化, 两千零两种文化。”(Snow, 1963: 62—63) 隔膜与误解无处不在。“两种文化”不过是揭示了一种对立, 选择了一个典型。还有别样的两分

法:实用学科与非实用学科,理论科学与应用科学,等等,同样存在着巨大的隔膜。

理解成了当代知识界的难题。怀德海说:“有一个关于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谚语。那个困难恰恰就是我所强调的那一点。教育的问题就在使学生通过树木而见到森林。”(Whitehead, 1932: 10)斯诺说:“我们需要一种共有文化,科学是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成分……理解应成为20世纪普通文化的一部分。”(Snow, 1963: 72)

实际上相互的隔膜只是“不理解”的最外在的现象,其深刻的危机在于因知识成了碎片,我们对我们的面临的新的境况的“不理解”,以及对自身命运的“不理解”。技术似乎从它产生时起就是指向外部的,从不对主体和“意义”作更多的关注。人文学科虽然一向关注“意义”,却因为一向不关心我们所必须生活于其中的大自然及必须选择的技术手段,已无力对一个被技术深刻改造了的社会提供意义上的指导。

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给我们带来了福与祸。实际上其每一面都在破坏和瓦解着旧的秩序和意义。祸的层面自然提醒着科学家全面地注视技术的社会后果和意义。而福的层面同样不简单。比如,死亡率降低了,人口压力却迫近了。福的层面中还有更深刻的后果。几千年,以至几万、几十万年中,人类的主要活动就是为了生存而奋斗。人类是这个地球上惟一寻找意义的动物。而千百年来这个意义又总是直接、间接地与生存奋斗相关联的。固然在这之上有了很大的升华,每个社会中也都产生了各自的贵族,他们不受生存必需物的困扰,但严酷的生存奋斗的氛围一直笼罩着人类。只是在工业革命告成的一二百年后,北部世界才在整体上第一次解决了温饱。科学技术的福利借着市场经济的力量迅速波及南部世界。这是巨大的福音,但也从此抽掉了以往多数人的生存意义的基础。

于是在价值观上出现了空前的危机。这一危机属于全人类,必须调动一切精神的、知识的资源去重建价值观。这之中最重要的是两支学科:科学与人文学。科学是从外部解释自然的本质,而人文学则是从内部理解人的活动。两者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科学遵循的是“关系逻辑”,它的主要兴趣在于事实、原因、规律、关系、结构、模式。而人文学遵循的是“什么逻辑”,即关注“什么”和“为什么”,其主要兴趣在于现象、实在、命运、自由意志、幸运、灾难、幸福、安宁、悲惨,等等。人文学科构成了一个特殊的知识领域,即人道主义的知识领域,它研究人的价值和人的精神表现,从而形成了有别于科学的范围。人文学的特征决定了它在人类重建价值中当然地要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是重建价值绝不是复制传统价值,因为我们已经处在一个新的生存环境中——一个被科学技术深刻改造过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因而必须有赖于人文学与科学联手去认识人的环境,人的状况,人类生存的价值与意义。怀德海曾说:“没有纯粹的技术教育,也没有纯粹的人文教育,二者缺一不可……贫乏的知识是不重要的,而且还可以成为邪恶。”(Whitehead, 1932: 74)今天,置身在一种全新的环境中,人类所面临的价值观的危机要求学科上的交流与融合。任何一种人文学中都应有科学的倾向,任何一种科学中都应有人文主义的倾向。

值得庆幸的是对普通教育、人文教育与价值观的重视在西方日益成为一种共识。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博伊说:“在许多领域里,技术已经成为目的本身。我们正在培养技术人员,但是时代的危机不仅仅与技术竞争有关,也与社会、历史前景不足和竞争与理智的灾难性的分离有关。”(Boyer, 1987, 111)麻省伍斯特多学科工艺学院这样表述它的教育思想:“只学习知识,而不学习价值观念是不行的。科学家与工程技术专家必须具备对现代科技与自己的工作决策对我们生活环境的影响作出评价的能力。从另一方面说,社会科学家和人文学家必须对技术的基本力量获得更深刻的理解。今天我们需要的是那些既了解技术又了解它的社会意义的人才,他们既懂得如何使用机器,又对机器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有清醒的认识。专业化必须建筑于跨学科的广阔基础之上,因为在当今的技术社会中,解决问题要求人们的思想具有宽阔的视野。”(Boyer, 1987: 114)英国教育家埃里克爵士说:“一个能够把自己学到的技术融汇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学生可以说是受到了人文主义的教育,而做不到这一点的学生,甚至连一个好的技术专家也配不上。”(转自 Boyer, 1987: 114)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对人文教育更轻视的还不是科学、技术、工业化、专业化更为发达的西方社会。统计资料远不能说明一切,但它仍是作出表象比较的最便利的工具。表1是中国、美国、前苏联、日本4个国家高等学校在校大专生、大学生、研究生按专业划

分的数量和百分比(见表1)。

表1 中国、美国、前苏联、日本高等学校在校大专生、大学生、研究生专业划分

| | 中国 | | 美国 | | 前苏联 | | 日本 | |
|--------|---------|------|----------|------|---------|------|---------|------|
| | 百分比% | 数量 | 百分比% | 数量 | 百分比% | 数量 | 百分比% | 数量 |
| 教育 | 548644 | 24.2 | 961865 | 7.0 | 996797 | 19.0 | 228605 | 7.9 |
| 人文学与宗教 | 108771 | 4.8 | 1307684 | 9.5 | 763326 | 14.5 | 485502 | 16.7 |
| 艺术 | 20236 | 0.9 | 472140 | 3.4 | 52610 | 1.0 | 76838 | 2.7 |
| 法律 | 46609 | 2.1 | 305181 | 2.2 | 36294 | 0.7 | * | * |
| 社会行为科学 | * | * | 731225 | 5.3 | * | * | 990747 | 33.5 |
| 商业管理 | 250256 | 11.0 | 2421455 | 17.7 | 312357 | 5.9 | * | * |
| 大众媒介 | — | — | 276173 | 2.0 | * | * | * | * |
| 家政 | — | — | 326462 | 2.4 | * | * | 164309 | 5.7 |
| 服务贸易 | — | — | 69994 | 0.5 | * | * | — | — |
| 自然科学 | 74322 | 3.3 | 496415 | 3.6 | * | * | 59030 | 2.0 |
| 数学与计算机 | 96883 | 4.3 | 525067 | 3.8 | * | * | 20891 | 0.7 |
| 医学与保健 | 223322 | 9.8 | 1407901 | 10.1 | 415311 | 7.9 | 160085 | 5.5 |
| 工程 | 720593 | 31.7 | 801126 | 5.8 | 2146367 | 40.9 | 488699 | 16.9 |
| 建筑与城管 | 15135 | 0.7 | 120827 | 0.9 | * | * | * | * |
| 工艺 | — | — | 214520 | 1.6 | * | * | * | * |
| 交通与通讯 | 39698 | 1.7 | 111129 | 0.8 | * | * | 1932 | 0.1 |
| 农业 | 12251 | 4.9 | 88333 | 0.6 | 530024 | 10.1 | 72852 | 2.5 |
| 其他 | 14052 | 0.6 | 3072653 | 22.4 | — | — | 170326 | 5.9 |
| 总计 | 2270772 | | 13710150 | | 5253088 | | 2899143 | |

资料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4年统计年鉴》。其中中国数据为1992年,日本为1991年,美国与前苏联为1990年。“*”表述该项数字散布在其他专业中。

在高等教育中,中国显然比其他国家更轻视人文学科,究其原因,第一,不在于自己的传统。中国古代教育几乎完完全全是人文学。孔子说:“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篇》)孔子的全部教育是围绕着礼与乐的。礼是人伦,是道德,是人际关系;乐是审美,是修养,是情趣。荟萃了孔子一生中诲人不倦的教育言论的《论语》充分说明了礼与乐是其教育的核心。孟子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孟子·滕文公章句上》)可以说,从三代至明清,从官学、私学到科举,中国教育的核心不出孔子奠定的基础:礼与乐,用现代学术语言来表述,就是人文教育。第二,其原因不在科学技术的引进。无论是科学的教育还是技术的应用,今天的中国都远远落后于西方,因而中国比西方更轻视人文学科就显然要另外寻找原因。

其根本原因在于40年来唯物主义世界观与历史观成为了官方意识形态,并凭借其庞大的宣传机器成为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的思想意识。在其笼罩下,高等教育中最重要的两大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和科学技术。几乎全部人文学,历史、哲学、文学、艺术都隶属于前者,于是丧失了自由、独立与多样性的人文学也就不再成其为人文学。

改革开放后市场经济进入中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极端——功利主义与拜金主义思潮又随之出现。商业管理、外贸、外语、经济、电脑等专业成了热门。人文学不是发财致富的利器,自然要被冷落。

这样,中国的人文学在政治与经济的夹击下腹背受敌。统计数字不过是其恶劣状况的最粗浅的指标。

近半个世纪以来发生在中国思想领域中的事情是,一个乌托邦激进主义极大程度上摧毁了一个古老的传统,继而其自身以令人惊讶的速度幻灭,在价值观的领域留下一片真空。如果说世界面临着重建价值观,那么中国首当其冲。价值重建有赖于一块丰饶的土壤作基础,这土壤就是繁荣的人文学。而无

论是人文学的发展与传播,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的交流与理解,还是受到科学与人文双重营养哺育的一代新人的产生,都极大地依赖于大学的改革。

3. 认识世纪末的世界形势,必须对两大因素给予高度重视:一是冷战的终结,二是全球化的趋势。

无论冷战有着多大的代价,是两大阵营间的均衡使得世界 50 年间无大战。冷战结束了,均衡打破了,和平靠什么来赢得?全球化的商战能否永久取代军战及冷战?抑或是如亨廷顿所说,意识形态的冲突将被文明的冲突所取代?

全球化的趋势是由两大力量推动的:一是日益增加的跨国公司的行为使得民族与地域间在商业利益上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均被系结在一个世界性的商业网络中;二是现代化的传播媒介极大地加速了全世界范围的信息的沟通与共享。这种渐变无疑已经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笔者认为,全球化的时代第一次将一种机会呈现在人类面前:一种利益交织的局面可望消解与超越民族与地域间的冲突。自然,无论是全球化商业活动的开展,还是我们假设的其乐观的后果——消解与超越民族冲突,都有赖于各民族间理解的加强。尽管亨廷顿没有作出如此乐观的展望,他在其《文明的冲突》的结语中也仍然期待:在可见的将来,不会有普世的文明,有的只是一个包含不同文明的世界,而其中的每一个文明都得学习与其他文明共存。

如果“学习与其他民族共存”不是一句空洞的说辞,我们就必须思考该怎样促进这种至关重要的“学习”,该怎样造就一种“学习”的环境。

其实,一种建立在切身体验基础上的深刻的理解只能从青年时代、甚至少年时代开始。而大学校园无疑是促进各民族青年交往和理解的不可替代的场合。全球化的商业活动就下限而言,需要更多的外语人才;就上限而言需要更多的“外国通”,即那些精通外国法规、风俗、传统、文化的人才。学校是社会的一面镜子。它应充分地为社会提供这样的人才。而与商业、信息的全球化相合拍,大学,特别是那些著名的综合型大学,应该具有全球化的特征,招收更多的外国学生,成为各国家、各民族青年的交流的场合。如是,必将对明日的世界发生深远的、积极的影响。

我们没有盲目乐观的理由。在这个商战的世界里,民族主义的思潮仍在涌动。固然这一思潮的代言人大多也是知识分子;但大学作为自由知识分子的社区,应当成为这一思潮的解毒剂,应该成为超越民族利益纷争,融汇多种文化,孕育新文明的园地。

曼海姆曾经说过:“知识阶层中的成员个人可能并常常具有某一特定阶级的倾向,在现实的冲突中他会站在这个或那个政党的一边,但是除去这些亲密关系,他还被这一情形推动着,即他受到的教育装备了他,使他可以从多种角度而不是像大多数社会争论的参与者那样只从一种角度看待当代的问题。他得到的装备使他比别人潜伏着更多的易变性。因为他有能力体验关于同一事情的一些相互冲突的认识方式,因此他更容易改变观点,很少对争论的一方负严格的义务。这种倾向偶尔会同一个人的阶级利益相冲突。他开放地面对同一问题的各个方面以及他较早地接触到对环境的相异的和形形色色的评价,使他在两极化社会的较大范围中不感拘束。”(K. Mannheim, 1956: 105)可能超越阶级关系的自由知识分子们为什么不可能超越民族主义的束缚呢?

如果说社会上有一个群体可以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它应该是自由知识分子的群体。如果说社会上有一个社区可以超越民族主义的冲突,追求一种更博大的文明,那么这一社区只能是大学的校园。

4. 大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功能是它为人类提供了一个专门致力于交流与理解的园地——不同思想与学说的交流,科学技术与人文学科的交流,在全球化的时代又需要在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间加强交流,同时它还致力于不同年龄的知识分子或准知识分子间的交流。

一个好的大学离不开好的教授,一个著名的大学离不开著名的教授。但是作为思想与知识的发酵地,研究所之所以比不上大学,还在于青年为大学提供着智力探索的活力。这种活力未必直接导致某种思想与知识的产生,但它永远是智力生活的重要氛围。大学中拥有包含着这种活力的代际交流,而研究所里没有。

曼海姆说：“青年时期和青少年时期，特别是学生们常常有过卷入到一个超越其前途利益的问题的经历。而当他们度过了这一狂飚时期并固定在一个职业以后便扔掉了那些倾向……但是不管冲突过去了没有，青春本身代表着对一种智力上的骚动的最有力的刺激。那是一个不确定的和充满怀疑的年龄，在这期间他的问题超出了他领受的答案的范围。我想把这种超越一个人的行动范围的努力称为‘超越性冲动’。它是每一项智力过程的基础……一些人认为无法长久忍耐、甚至领略一种开放的眼界，一种没有最终确定性的悬置状态，一种某一文化所固有的不断的面对选择。而悬置也是一条可以通行的道路。一些人认为它是青春的插曲，另一些人则将之接受为一种生活方式。”(K. Mannheim, 1956: 164)这种生活方式就是某种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为了坚守这种“悬置”而非凝固的态度，他们必须借助青年学生作后盾，尽管学生中的多数人只是在青春期短暂地进入这种精神状态。

以上观点对于西方社会似乎没有特别的意义。西方的大学就是其知识分子的最重要的社区，其大学中自然不缺少青年学生及代际间的交流与争论。而对于中国知识分子则具有非常紧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有大批的研究院。仅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各省级社会科学院就拥有研究人员一万余人。自然科学院的人员大约近十倍于此。这些知识分子远离大学，丧失了与青年学生的交流，脱离了那个多向交流、争论不休的知识分子的社区。这一损失是双向的：既是学生的损失，他们失去了向一些优秀学者学习的机会；也是学者的损失，他们失去了自己生存的社区，一个充斥大量信息、包含各色人等——老人、年轻人、外籍人、激进主义者、保守主义者，不断刺激自己去思考的社区。尽管大学有种种不尽人意之处，它仍然是最适宜知识分子生存的社区。

对于很多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尚面临着寻找社区的问题。对于全人类的知识分子而言，仍面临着建设自己的社区的问题。

参考文献：

贝尔·丹尼尔，1986/1973《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译本，商务印书馆。

矢仓久泰，1982/1978，《学历社会》，中译本，吉林人民出版社。

雅斯贝尔斯，1991/1977，《什么是教育》，中译本，三联书店。

尤西林，1996《人文学科及其意义》，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Boyer, Ernest 1987, *College: The Undergraduate Experience in America*, Harper & Row Publisher, New York.

Coser, Lewis 1970, *Man of Ideas*, Macmillan Company.

Mannheim, Karl 1956 *Essays of Sociology of Culture*, London.

Russek, B. 1926 *On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Early Childhood*, Unwin Brothers Ltd. Working.

Snow, C. P. 1963 *The Two Cultures*, 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

Whitehead, A. N. 1947, *The Aims of Education*, Williams & Norgate Ltd., London.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张宛丽